

「魯迅研究」史料叢刊之一

魯迅先生二三事

孫伏園

魯迅先生二三事

孫伏園

版 出 屋 書 家 作



## 引言

爲要紀念魯迅先生，應該好好的寫一本書。現在却決不是時候，不但參考書籍幾乎全無，故老友朋也無從訪問，就說時間和心情又何嘗有比較成片段的！

這個大願只好牢牢的記在心頭罷。

小冊裏面的十篇東西，「哭魯迅先生」和「藥」是五年前先生剛去世的時候寫的，「魯迅先生的幾封信」比那兩篇略後，「惜別」和「往事」寫於三十年初春，「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和「雜感兩則」都寫於三十年十月先生逝世五週年紀念日，「孔乙己」和「臘葉」和「楊貴妃」則是知道要出小冊以後才補上的。

這些話倒是將來還是要說的，那麼這個小冊就算是將來那本書的初稿的一部分

而暫時保存着罷。

百二十分感謝姚蓬子先生，要不是他的鼓勵和催促，我是決沒有這個勇氣的。

三十一年二月八日。孫伏園。

# 目 錄

哭魯迅先生	一
「藥」	一四
「孔乙己」	二四
「臘葉」	二九
「楊貴妃」	三六
惜別	四三
【附錄】兵元前的魯迅先生（景宋）	

往事·····	五七
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	六四
魯迅先生逝世五週年雜感兩則·····	七一
魯迅先生的幾封信·····	七六

## 哭魯迅先生

像散沙一般，正要團結起來；像癱病一般，將要恢復過來；全民族被外力壓迫的剛想振作，而我們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奮進的大將忽然撒手去了。

魯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於一天半以後才在定縣得到。十月廿日的下午三點鐘，我被零碎事情纏繞得還沒有看當天的北平報，多承紫述初兄跑來告我這樣一個驚人的消息。從此一直到夜晚，我就沒有做一點工作，心頭想的，口頭說的，無非魯迅先生。我沒有哭。我本來不敏感，後來學鎮定，最後却因受刺激多了，自然成就了麻木。但我覺得這一回我所受的刺激是近幾年來少有的。

我回憶到廿五年以前去了。

我最初認識魯迅先生是在紹興的初級師範學堂。那一年是宣統三年，我十八歲，在紹興初級師範學堂上學。浙江光復以後，紹興軍政府發表師範學堂的堂長是原來紹興府學堂學監周豫才（樹人）先生，就是日後的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學生相見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頭上却戴一頂陸軍帽。這陸軍帽的來歷，以後我一直也沒有機會問魯迅先生，現在推想起來，大概是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的制服罷。魯迅先生的談話簡明有力，內容現在自然記不得了，但那時學生歡迎新校長的態度，完全和歡迎新國家的態度一樣；那種熱烈的情緒在我回憶中還是清清楚楚的。

我是一個不大會和教師接近的人：一則我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請教；二則我頗厭倦於家庭中的恭順有禮的生活，所以不大願意去見師長。我和魯迅先生的熟識却是因為職務，我那時正做着級長，常常得見學校的當局。記得一件奔走次數



最多的事是學生轟走了英文教員，魯迅先生的態度以爲學生既要自己挑選教員，那麼他便不再聘請了。我於是乎向校長和因學兩方面奔走解釋。那時魯迅先生說：「我有一個兄弟，剛剛從立教大學畢業回來，本來也可以請他教的；但學生的態度如此，我也不願意提這個話了。」這指的便是周啓明先生。同學聽到這個消息以後，非要我努力請到這位校長的兄弟繼任英文教員不可，但是我稚弱的言辭始終沒有打動校長的堅決，英文講席到底虛懸，只是年考時居然喜出望外的來了周啓明先生給我們出題並監試。

魯迅先生有時候也自己代課，代國文教員改文。學生們因爲思想上多少得了魯迅先生的啓示，文字也自然開展起來。大概是目的在於增加青年們的勇氣吧，我們常常得到誇獎的批語。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賀南京政府成立並改用陽曆一類題目的文後得到「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八個字。直到現在廿五年了，我對這八個字

還慚愧，覺得沒有能副魯迅先生的期望。

魯迅先生不久辭了校長。後來知道魯迅先生交代的時候，學校裏只剩了一毛多錢；也從旁處聽見軍政府如何欠付學款，及魯迅先生如何辛苦撐持。那時候一切都混亂，青年們發現了革命黨裏也有壞人，給予簡單的頭腦一個不期待的打擊。

對於舊勢力的擡頭，這却是一個極好的機會。繼任魯迅先生作校長的，正如繼任孫中山先生作總統的：這個對比，全國各地，無論上下，都極普遍。欠付學款的軍政府，因為種種措施不妥，後來成了全紹興攻擊的目標，舊勢力找到革命黨的罅隙，乘機竭力的掙扎出來。青年們一般的陷入苦悶，我也不再進那個學校。

魯迅先生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他的苦悶也許比一般青年更甚，只要看他在創作「狂人日記」以前幾年，住在紹興會館鈔古碑的生活就可知道。不過外面雖然現着異常孤冷，魯迅先生的內心生活是始終熱烈的，彷彿地球一般，外面是地

殼，內面是熔巖。這熔巖是一切偉大事業的源泉，有自發的力，有自發的光，有自發的熱，決不計較甚麼毀譽。例如向金陵佛經流通處捐資刻「百喻經」，又如刊行「會稽郡故書雜集」，這種不含絲毫名利觀念的提倡文化事業，甚至一切事業，在魯迅先生的一生中到處可以看得出來。

凡是和魯迅先生商量甚麼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無不熱烈真誠的給你助力。他的同情總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即如他爲晨報副刊寫文字，就完全出於他要幫助一個青年學生的我，使我能把報辦好，把學術空氣提倡起來。我個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質的鼓勵，真是數也數不盡。當我初學寫作的時候，魯迅先生總是鼓勵着說：「如果不會創作，可以先翻譯一點別國的作品；如果不會寫純文藝的東西，可以先寫一點小品雜記之類。」許多人都是受到魯迅先生這種鼓勵得到成功的，我也用了魯迅先生這話鼓勵過比我更年青的人，

只是我自己太愚魯，也太不用功，所以變成了例外。

至於爲人處世，他幫忙我的地方更多了。魯迅先生因爲太熱烈，太真誠，一生碰過多少次壁。這種碰壁的經驗，發而爲文章，自然全在這許多作品裏；發而爲口頭的議論，則我自覺非常幸運，聽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經籍給我的還多。我是一個甚麼事情也不會動手的人，身體又薄弱，經不起辛苦，魯迅先生教我種種保衛鍛煉的方法。現在想起來真是罪無可道：我們一同旅行的時候，如到陝西，到廈門，到廣州，我的鋪蓋常常是魯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穌嘗爲門徒洗腳，我總要記起這個故事。

在陝西講學，一個月時間得酬三百元。我們有三個人不到一月便走了，魯迅先生和我商量：祇夠旅費，我們應該把陝西人的錢在陝西用掉。後來打聽得易俗社的戲曲學校和戲園經費困難，我們便捐了一點錢給易俗社。還有一位先生對於

藝術沒有多少興趣，那自然聽便。西北大學的工友們招呼得很周到，魯迅先生主張多給錢。還有一位先生說：「工友既不是我們的父親，又不是我們的兒子；我們下一趟不知甚麼時候才來；我以為多給錢沒有意義。」魯迅先生當時堵着嘴不說話，後來和我說：「我頂不贊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麼時候才來』說，他最少給讓他少給好了，我們還是照原議多給。」

魯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簡單，衣食住幾乎全是學生時代的生活。他雖然作官十幾年，教書十幾年，對於一般人往往無法避免的無聊娛樂，如賭博，如舊戲，如妓院，他從未沾染絲毫。教育部的同人人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這所謂怪者無非書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只穿舊布衣，像一個普通大學生。西服的褲子總是單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魯迅先生也永遠穿着這樣的單褲。

一天我聽周老太太說，魯迅先生的褲子還是卅年前留學時代的，已經補過多少



回，她實在看不過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條棉褲，等魯迅先生上街門的時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換上，萬不料竟被他找出來了。老太太認爲我的話有時還能邀老師的信任，所以讓我勸勸他。

魯迅先生給我的答話却是不平庸的：「一個獨身的生活，決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豈但我不穿棉褲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沒有換的舊棉花，我不願意換。你再看看我的鋪板，我從來不願意換藤紉或棕紉，我也從來不願意換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這是的確的，魯迅先生的房中只有床鋪，網籃，衣箱，書案，這幾樣東西。萬一甚麼時候要出遠，他只要把鋪蓋一捲，網籃或衣箱任取一樣，就是登程的旅費了。他永遠在替門戶途中，從來不夢想甚麼是較爲安逸的生活。他雖然處在家庭裏，過的生活卻是一副獨身者。

魯迅先生的北平寓所是他自己經營的。有一位教育部的同事李老先生最幫忙，在房屋將要完工的時候，我同魯迅先生去看，李老先生還在那兒監工，他對我客氣到使我覺察他太有禮貌了。我非常局促不安。魯迅先生對他說：「李先生不要太客氣了，他還是我的學生」。李老先生的態度這才自然得多了。魯迅先生自己待朋友，和朋友待他，大抵是如此義俠的。他把友敵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 *Spy*，某人是 *Traitor*；一個不幹過革命工作的或只是尋常知識社會或商業社會的人是不大會瞭解的，他們祇瞭解酒食徵逐的或點頭招手的相好。而魯迅先生的朋友大抵是古道熱腸的。他後來同我說，「你著李先生這種人真是好朋友，幫我那麼多日子的忙，連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李先生替魯迅先生的北房之後接出一間房子去，用玻璃窗，近乎畫室，作為魯迅先生的寫作場所。魯迅先生和我便到這間房子中坐下。魯迅先生說：「我將

來便住在這個老虎尾巴裏。一因爲這間房子是在全房屋的後面拖出一條去，頗像老虎之有尾巴；一直到魯迅先生離開北平，一切寫作及起居，都在這老虎尾巴之中。老虎尾巴的北面還有後園，自然是因爲老虎尾巴而縮小多了。散文詩「秋夜」的開頭便說：「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似乎便是魯迅先生坐在老虎尾巴中的創作的第一篇。

到廈門，到廣州，我和魯迅先生都在一起。魯迅先生到一處新地方，都是青年心理，抱一腔很大的希望。廈門風景的闊大曠野，可做的工作之多，初到時給予我們的印象實在深刻。後來固然因爲廣東方面的不能推却，只有離開廈門到廣東去，但是廈門的許多人事，我後來聽魯迅先生說，那真是初去時所不及料的。

廣東給人的希望更多了。但是結果也和廈門一樣。魯迅先生後幾年多用時間於寫作，關於廈門和廣州，都有詳盡的紀載；我却被武漢，歐洲，定縣，這三段不

同的生活所隔，有時翻閱魯迅先生紀載華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了。只是魯迅先生從廣州北返上海時，和我將要從上海動身赴歐洲時，這中間我們有許多次談話的印象至今還是深刻的。我從歐洲回國，以後便長期住在華北的農村裏，曾有三四次經過上海，總是匆促的很。周喬峯先生在商務印書館，訪問比較方便，有時也正值魯迅先生的住址不能公開，我於是只求喬峯先生代為問好，屈指一算違教已經八年了。

十月廿日下午三點鐘的消息，鉤起我廿五年來的回憶。這回憶，用了廿五年的時間，清清楚楚的寫在我的生活上，我無論如何沒有法子再用筆墨翻譯成文字的了。能翻譯的也許只是最不精彩的一部分。

廿一日我到北平，廿二日往謁周老太太。魯迅先生的客廳裏原來掛着陶元慶先生所作的木炭畫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點；即在這畫像前供了一張書案，上有